

智利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双重世代差异*

——基于圣地亚哥市的个案研究

陈咏媛

摘要: 基于个案研究的方法, 结合公开的档案资料、20 个深度访谈和 260 份问卷调查的结果, 从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两个层面分析了智利圣地亚哥华人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 大部分受访者倾向于建立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 其次是双重身份认同(既是中国人, 也是智利人), 只有极少部分的受访者认同智利人的民族身份; 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存在交互效应, 在青年一代中, 第一代移民比其他后代移民更认同其中国人的民族身份, 而非双重民族身份或智利人的民族身份; 而在中老年一代中, 移民世代并不会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显著差异。本文丰富了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研究, 为相关理论的拓展提供了实证支持。

关键词: 智利华人 移民 民族身份认同 个案研究

一、问题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 人员、信息与文化的跨国流动使人们的民族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做出思考和进行选择的问题(韩震, 2010)。在研究身份认同的议题时, 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群体。据《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0)》^①统计, 大约有 4600 万海外华人散居在中国领土以外的世界各地。

依据迁入国在民族构成和移民政策等方面的特点, 典型的海外华人社会可以分为大致三类(刘宏, 2015): 第一类是在民族国家转向移民国家中逐步生根的华人群体, 这些华人群体经历了一个由被排斥到被包容的发展历程, 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群体(Wang, 1992; Kuhn, 2008; 张小倩, 2016); 第二类是在宗教冲突和族裔冲突较为激烈的国家中日益壮大的, 组群内部分化明显, 具有碎片化和多元化特征的华人群体, 如欧洲和美国的华人群体(李明欢, 2009; Zhou, 2009); 第三类是在移民国家中形成的, 以新移民为主体的华人群体, 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华人群体(杜倩萍, 2015; 郭世宝等, 2014)。

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及跨境迁移的日益频繁, 一些新的地域开始受到华人移民的青睐。和传统的人口流入国相比, 这些国家的华人群体总量并不大, 但增速较快, 且不能被简单地划归到上述的某一类。以智利为例, 智利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传统的民族国家和人口流出国, 但其近年来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治安状况使其在拉丁美洲脱颖而出,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从智利的华人群体来看, 近年来其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截止 2015 年, 华人移民的数量已经占到总移民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生态视角下流动人口动态社会融入的心理机制研究”(16CSH045)的阶段性项目成果。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吴莹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文责自负。

① 李慎明、王逸舟, 2009,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的1%^①，且人数还在持续上升，是一个越来越引起关注的群体。并且，海外华人的移居行为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异质性，迁居而不入籍，入籍而不定居日趋常态，这使得海外华人社会表现出新的形态。在此背景下，个案性质的国别研究仍然可以不断完善对海外华人群体的理解和认识。

在对海外华人的研究中，身份认同尤其是民族身份认同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议题。在理论发展上，早期的研究较为关注不同地区海外华人的整体表现，近期的研究则逐渐聚焦于华人社会的内部分化（李明欢 2009）。既往研究普遍发现，后代移民往往能够很好地融入本地社会，因而比第一代移民更倾向于建立双重民族身份认同（Zhou & Cai 2002）。然而，除了移民世代的“普遍性”影响之外，年龄世代的影响更能反映出时代变迁的意涵和当地移民社会的本土特征。例如，随着华人在移居国的艰苦奋斗，其经济水平逐渐提升，一些青年世代的后代移民有机会接受较好教育，继而成为精英人士融入主流社会，建立对移居国的身份认同；而一些中老年的1.5代移民或二代移民能获得的教育资源相对较少，仍然受限于语言障碍，无法融入移居国的主流文化（李明欢 2009）。总而言之，在研究移民世代对移身份认同的影响时，还应同时考量年龄世代的影响，而这一内容在既往研究中尚未充分讨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聚焦于智利的华人群体，通过对智利圣地亚哥华人的个案研究，探索其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特点，考察年龄世代及移民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双重影响，并对其未来的变化趋势予以分析，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研究。

二、文献梳理和分析思路

（一）智利华人的概念辨析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智利的华人群体已初具规模。据中国驻智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估计，目前在智利生活的华人逾2.5万人，大部分生活在首都圣地亚哥市和北部的伊基克市和安托法加斯塔市。最近十多年来，首都圣地亚哥市的华人数量尤为众多，且在移民构成上分布更广（李方仁、陈文君 2015）。在这些长期生活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华人中，既有已经取得智利永久居留权或国籍的华人，也包括移居到智利不久，尚未取得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华人，还包括这些华人的后代。^②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结合公开资料和调查组在圣地亚哥市取得的调研资料，以“智利华人”来统称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依据“离散华人”研究中有关文化依恋的理论视角（李明欢 2010）来分析和解释海外华人民族身份认同的生成机制。

（二）海外华人民族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1. 海外华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内涵

“认同”（identity）的概念源自哲学，指两个事物相同时的同一律公式，后来心理学家将这一概念迁移到心理学的范畴中，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和心理学上的趋同过程（赵志裕等，2005；万明钢等 2012）。此后，“认同”的概念被广泛用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中。经典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人们会采用自己和他人的某些社群的成员资格（group membership）来建构自己和他人的成员身份（Tajfel, 1982）。民族身份认同则是以民族作为社群的基本单位时产生的社会认同。学界对“民族”一词的界定有不同的角度，一者是从血缘和文

^① Doña-Reveco, Cristián & Amanda Levinson 2017, “Chile: A Growing Destination Country in Search of a Coherent Approach to Migration.”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hile-growing-destination-country-search-coherent-approach-migration/>).

^② 在圣地亚哥和智利其他地区还有少数（访谈资料显示其人数不到500人）早期华侨的后代。尽管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有华人血统，但因为缺乏中文学校等历史原因，大部分不懂中文，且因其家庭成员中已经没有华人，和智利华人社会及中国大陆的联系都很少，因而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海外华人的范畴。

化的角度来描述,等同于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如智利的欧裔(即白人)、土著裔、华裔等亚群体;另一者把民族(nation)理解为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对统一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此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较大的重叠,政治性的意味较浓(万明钢,2012;戴晓东,2005)。为了与已有海外华人或移民研究的语境保持一致,本文倾向于用第一种方式来界定民族认同,认为其反映的是个体保留移居国或中国传统文化、行为规范和道德水准的程度,主要涉及对乡土、文化的情感联系,从而突显从移入国居民的角度探讨智利华人生活及社会状况的特征。

2. 年龄世代与移民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双重影响:一个三维的分析框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族群认同的理论蓬勃发展,一些典型的理论包括族群边界论、民族想象论、工具论、原生论、符号论等等(刘权,2015)。这些理论有的聚焦于民族认同的动机,有的聚焦于民族认同的过程,视角各不相同。本文基于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研究进展,尝试提出了一个三维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从先赋性认同、结构性认同和建构性认同三个维度来理解民族认同的形成机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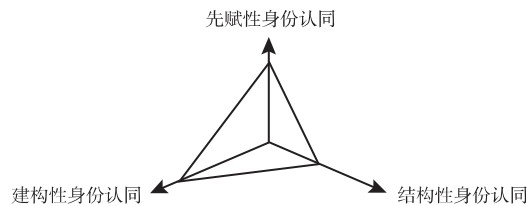


图1 海外华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分析层次

许多研究认为,民族认同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强调先赋性因素的观点被冠之以“原生论”的标签。本文认为,先赋性认同是指由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进行类别化以后产生的认同。对海外华人而言,原生家庭的构成和亲属网络尤其是直系亲属的身份会决定其先赋性认同的结果。

以往研究发现,当父母一方来自本地民族时,移民后代更容易建立本地民族的身份认同或双重身份认同;而当海外华人的直系亲属主要由华人构成时,更容易建立祖(籍)国的民族认同。对智利华人而言,早期的一代移民(中老年世代)由于语言不通,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不高等原因,很少与当地通婚;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华人投奔到智利的亲属,虽然他们属于后代移民的范畴,但很多人仍是在国内结婚之后才举家搬迁到智利,跨民族婚姻在华人中的比例较低。^①此外在其他地区的一些研究发现,海外华人群体内部还会因为祖籍地(如是广东还是福建)的地缘差异而进一步分化,形成一些更为碎片化的亚群体(李明欢,2009;郭世宝等,2014)。但在智利华人的地缘构成上,处于中老年世代的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广东省。近年来,由于智利良好的经商环境,许多来自大陆其他地区(如福建、浙江、江苏和北京)的华人和其他国家(如欧洲和拉美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也纷纷到移居到智利。但总的来说仍以广东人为主,且不同地域的人之间比较团结,暂时没有严重的内部分化。由此可以推测,在先赋性认同的维度上,智利华人更有可能建立中国人的民族认同。

结构性认同通常是关注制度性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涉及一个地区的移民制度、国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内容。许多研究大多从生存理性的角度来探讨结构性认同。在一些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和人才引进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②澳大利亚等地,有很多政策鼓励和帮助少数族裔的发展,这

^① 包容总编,2013,《智利智京中华会馆120年简史(1893-2013)》,非正式出版物。

^② 自1986年始,加拿大政府为补充其自身资本和人才的缺口,实施了“投资移民计划”,再加上以前实行的“技术移民计划”,鼓励国外的富裕阶层和专业人士移居加拿大。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移民保留其先赋性的民族认同,或建立双重民族认同(郭世宝等 2014)。而在倡导同化主义的民族国家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东南亚地区的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华人因各种倾向于本地民族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而被歧视和排挤,如何在移居国生存下去成为他们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一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华人并没有因其边缘化而更强调其祖籍国的民族身份,相反,他们会通过与本地人通婚,改换姓氏和宗教信仰等方式去实现民族身份的转化,以便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张小倩 2016)。然而,同样是倡导同化主义的欧洲国家(如法国),一些非精英的华人虽然也处于边缘地位,但却较难有机会通过通婚等方式融入主流社会,而是生活在传统的华人社会中(王春光等,1999),从而很难形成对本地民族身份的认同。

智利的族裔分布为欧洲裔白人和欧印混血占将近90%,其他族裔的人相对较少,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尽管近年来移入人口有所上升,但在宏观层面仍属于人口的输出国,因而在国家层面鲜有相应的措施鼓励移民的社会融入,且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也主要向国民而非移民倾斜。^①总的来说,相较于整个智利社会,华人群体的规模很小,处于比较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尽管智利华人在一些饮食习惯和文化习俗上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但中老年世代的移民(无论是第一代还是后代移民)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西班牙语教育,语言能力十分有限,也不熟悉当地的法律,很多华人在遇到纠纷时仍会选择私下解决或默默忍受(李仁方、陈文君 2015)。随着青年世代的第一代新移民和在智利土生土长的后代(二代和三代)移民逐渐摆脱了语言上的劣势,这一情况已有所好转,^②一些华人已经开始使用法律捍卫自己在智利的合法权利,使得华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另一方面,在中老年世代的移民中,大多数人都是华裔,其工作环境集中于华人圈子,也使得其更倾向于建立中国(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而在青年世代中,不乏一些在智利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精英华人。他们逐渐进入主流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其建立本地民族认同的屏障。由此可以推测,在结构性认同维度上,智利华人更有可能认同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而不是智利人的民族身份或双重民族身份,且这一倾向在中老年世代的移民和处于青年世代的第一代移民中更为凸显。

建构性认同和海外移民的社会认知过程有关,在以往的研究中多被作为先赋性认同和结构性认同的一部分予以探讨。本文将其专门作为一个维度提出,意在突出社会化过程和社会交往对身份认同的影响。首先,既往研究发现,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社会化的影响,其形成动机和自尊及族群归属感有关。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陈志明发现马来西亚华人有关峇峇人的身份认同和其社会化的方式有关,而不是取决于其父母是否是峇峇人,或峇峇人身份有更高的工具性价值(Tan, 1997)。既往研究显示,当代的智利华人家庭大多十分重视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的传承(李颖、何涛 2010),无论是哪个年龄世代或移民世代的智利华人,其社会化过程中都打下了“中国人”的身份烙印。

然而,社会认知的建立离不开社会交往的影响。相较于一代移民,后代移民的直系亲属和社交圈中可能有更多的当地人,因而更容易建立双重认同,而非祖籍国的民族认同(Lee & Zhou 2004)。然而,社会交往的前提条件是经济能力和语言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幅崛起,青年世代的第一代移民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突破了语言障碍,并且,移居行为本身并不完全是经济驱动,而是追求某种生活方式(李明欢 2009; 刘宏 2010),有融入能力,但不一定有融入意愿。相比之下,同为第一代移民,中老年世代的移民往往是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想法抵达移居国,愿意在当地扎根,有融入意愿,但欠缺社会交往和社会适应的能力。因此,即使在同一个移民世代之内,移民的身

^① Doña-Reveco & Levinson, 2012, "Chile: A Growing Destination Country in Search of a Coherent Approach to Migration."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hile-growing-destination-country-search-coherent-approach-migration>).

^② 2014,《智利一商城违规增加店面房租,华人商户成功维权》,11月5日(<http://www.chinaqw.com/hqhr/2014/11-05/24986.shtml>).

份认同可能还可能存在年龄世代上的代际差异。

总而言之,海外华人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终极选择是整合了三个层面的身份认同之后,比较和选择的结果。综合前文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大部分智利华人建立的是中国(华)人的民族认同,而非双重认同或智利人认同。

假设 2: 年龄世代会调节移民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在青年世代中,第一代移民比二代移民更倾向于建立中国(华)人的民族认同,而非双重认同或智利人认同;而在中老年世代中,由年龄世代导致的认同差异并不显著。

三、数据和分析策略

(一)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赴智利调查组于 2017 年 9 月在智利圣地亚哥市采集的数据。该调查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覆盖了在智利圣地亚哥长期生活的华人 315 名。受访者由智京中华会馆和中华文化中心中文学校帮忙搜集。其中智京中华会馆在圣地亚哥有百年历史,是目前智利地区最大的华人社团,社团成员来自于中国大陆各个地区,移民世代分布广,移民类型较为多元化,但该会馆的成员多为第一代移民和一些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1.5 代移民。中华文化中心中文学校已开办 13 年,学生以青年人为主,多为出生在智利的第二代及以上的华人移民。删除在关键变量上有缺失值的信息后,剩余 260 名受访者,问卷有效作答率 82.5%。

此外,本研究还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受访者中收集了 20 个案例访谈的资料。受访者的年龄范围从 28 岁到 71 岁,教育程度从小学毕业到硕士研究生,涵盖多种不同的迁移类型和家庭背景。与定量分析部分有所不同,基于案例访谈的质性资料有助于研究者深入挖掘不同因素影响民族身份认同的机制,从而有助于分析和把握智利华人民族身份认同的成因。

(二) 分析策略

本研究关注的是智利华人在民族认同上的特点及其潜在影响因素。为此,本研究将采用混合方法,结合问卷调查资料和访谈资料予以分析,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步骤:首先,分析智利华人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整体特征;其次,采用逻辑斯蒂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考察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是否与民族身份认同的类型显著相关;最后,在问卷调查的结果上,结合公开史料中对智利华人迁移历史的记录和深度访谈的质性资料,归纳和提炼出各因素影响民族身份认同的机制。总体而言,本研究中对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的结合可以较好地发掘并呈现民族身份认同的整体图景。

(三) 关键变量的操作化

1. 民族身份认同

本文参考了康莹仪等(Hong et al., 1999)对身份认同的测量方式,设计了一道包含以下七个选项的单选题测量受访者的民族身份认同,分别是:我是中国人;我是智利人;我既是中国(华)人也是智利人;我首先是中国(华)人,其次是智利人;我首先是智利人,其次是中国(华)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其他(请注明)。

2. 移民世代

一般而言,移民世代可划分为一代移民,二代移民和三代移民等。一代移民是指出生地在其他国家,随后又赴另一移民国移民发展的人群;二代移民是指“第一代移民”在移民国所生的子女;第三代移民是指“第二代移民”在移民国所生的子女。然而,公开史料^①和调查组获得的深度访谈资

^① 包容总编 2013,《智利智京中华会馆 120 年简史(1893-2013)》,非正式出版物。

料均显示,一些父辈或祖辈首先移居到智利的受访者实则是在10-30岁之间移居到智利的,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二代移民和三代移民的定义。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将移民世代划分成两类,分别是第一代移民和后代移民。

3. 年龄世代

本文综合采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对青年世代的界定,将14-35岁的受访者界定为青年世代;将36岁及以上的受访者界定为中老年世代。

4. 其他控制变量

除此之外,结合既往研究的发现,将性别、国籍(智利国籍、或智利永居权的中国国籍及未获得智利永久居住权的中国国籍)、每年在智利的居住时间作为控制因素,纳入到具体的统计分析中。

四、研究结果

(一) 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问卷调查中受访者的各项身份特征信息见表1。由表1可知,问卷调查的样本有以下特征:男女比例平均,各占50%;受访者年龄范围为14-72岁,平均年龄为 38.55 ± 13.12 岁,其中青年世代占45.8%,中老年世代占58.2%;在国籍类型上,以已获得智利永久居住权,但保留中国国籍的受访者为主,占整个样本的61.2%,其次是中国国籍,且未获得智利永久居住权的受访者,占整个样本的25.4%,改换智利国籍的受访者占13.5%;在移民世代的分布上,第一代移民占62.3%,其他后代移民占37.7%;在职业的分布上,经营住宿和餐饮业的受访者占47.1%,零售和批发业的受访者占27.7%,从事其他行业的受访者较少;从省份的分布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来自于广东省,占69.5%;从受访者每年在智利居住的时间来看,大多数受访者全年生活在智利,占68.5%;(8)从恋爱及婚姻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的配偶都是华人,占74.6%。^①

(二) 民族身份认同的整体情况分析

本调查发现,智利圣地亚哥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呈现出极化的趋势(见图2)。在接受调查的260名受访者中,有216名(83.1%)受访者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认同智利人身份的非常少,仅有6名(2.3%),另有38名(14.2%)建立了双重身份认同(包括三个选项,分别是:既是中国人,又是智利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智利人;首先是智利人,其次是中国人),只有1人选择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或者建立其他形式的认同(0.4%)。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智利华人建立的都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双重认同的受访者并不多,更鲜有受访者认同智利人身份。那么,为什么智利华人大多认同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而少有建立双重认同和智利人的身份认同呢?本文尝试结合案例访谈的内容,从先赋性认同、建构性认同和结构性认同的视角分别对智利华人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成因进行剖析。

1. 先赋性认同

首先,从先赋性认同的层面来看,在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跨国婚姻的比例较低,大部分受访者的父母和配偶都为中国人,是十分典型的“中国人”家庭,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较为清晰。需要指出的是,受访者中的一部分多代移民是在成年之后先在国内成家再移居智利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较低的跨国婚配的比率。此外,本研究也在访谈中考察了华人内部是否会建立地域性的民族认同。访谈资料显示,由于智利华人的总体数量不大,早期移民以广东人,尤其是广东鹤山人为主,尽管近年来也有一些来自江苏、福建和浙江的中国人抵达智利,但相比而言,这些新移民的流动性较大,并不一定打算在智利扎根。仅就目前而言,地域性组织的实体性不强。因此智利华人群体并没

^① 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具体的统计分析表格,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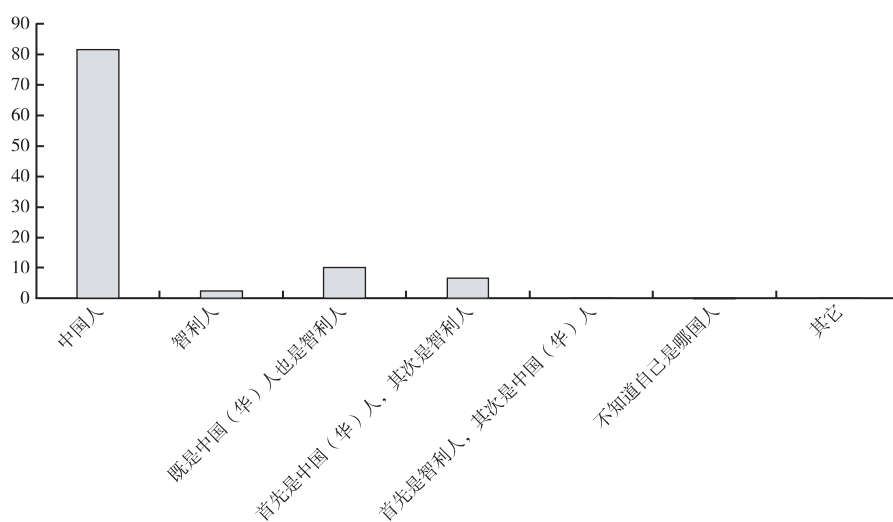


图2 智利圣地亚哥华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分布情况

有进一步形成明显的亚群体认同。另一方面, 尽管一些影响力广泛的华人组织是以广东人为主, 但这些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十分强调“中国人”或“华人”的民族身份, 积极团结来自其他省份的中国移民。这一点在访谈资料中也被反复提及。

我们 ZHHG 每年两次大活动, 比如说 9 月 18 号烧烤活动, 都是差不多几百上千人参加的郊外烧烤活动。还有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会邀请来自各个省份的所有侨胞来参加我们的联欢晚会。联欢晚会我们采取那种叫其他餐厅承包的方式。每年起码超过 80 桌的侨胞来参加。(L 先生)

2. 结构性认同

智利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 但智利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 本国政府没有出台一些具体的举措来帮助移民融入智利社会, 因而作为第一代移民, 往往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会。另一方面, 尽管智利社会的少数族裔较少, 但从社会福利政策而言, 也没有歧视少数族裔的政策, 因此, 认同中国人和华人的民族身份和生存理性是不相冲突的。正是因为智利华人群体相对边缘化的社会处境, 一些华人需要借助华人的民族身份, 彼此支持, 借以获得更为公正的待遇。

比如说去年, 去年有一件事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们一位广东侨胞被盗贼杀害了。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 马上联系了会馆, 商报、使馆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协助、配合工作。并且在短短的三天之后, 组织了超过一千人侨胞的和平请愿队, 在总统府的广场里和平进驻, 我们穿的是统一服装。当时请愿的目的, 就是要求当地警方改善我们的这边经营环境。(L 先生)

3. 建构性认同

从海外华人的社会化过程来看, 对早期移民而言, 大多是在中国大陆成年后抵达智利。因此, 中国人或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也伴随着其社会化的过程自然形成。而对在智利出生和长大的后代移民而言, 往往会在家长的要求下, 从小接受系统的中文教育或中国文化方面的熏陶。调查显示, 几乎每个华裔子女都有被父母送到中文学校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经历。从家庭中最小成员是否学习中文的情况来看, 在 315 个受访对象中, 只有 1 位受访者承认自己最小的孩子从来没学过中文。此外,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 海外华人的定位逐渐从原来的“历史包袱”转

变成“身份优势”。一些海外华人还会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能改换国籍,必须维持中国人的身份。

此外,一些华人社团定期组织的一些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文艺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智利华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

我感到这几年搞的中国舞台文艺,比如山西的威风锣鼓,我们二三十个人一起敲,气势很大,很壮观,在华人中很有影响。一提大胡子,大家都知道是我。(X先生)

(三) 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

随后,本文采用二分类评定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model)考察了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在建构模型时,本文做了以下的考量和设置:由于受访者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得分分布不均,因而研究者进行了二次编码,将选择中国(华)人民族认同的编码为1,将选择其他类型身份认同(智利人民族认同,双重民族认同等)的编码为0;在模型中纳入了国籍、年龄、性别、配偶情况和每年在智利的居住时间作为控制变量。统计分析的结果见表1。

统计结果显示: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的交互作用显著($p=0.040$),分组检验表明,在青年世代中,第一代移民和后代移民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显著,第一代移民比后代移民更倾向于认同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其概率是后者的6.624倍($p=0.003$);而在中老年世代中,民族身份认同不存在移民代际的差异($p=0.501$);国籍及永居权身份与受访者的民族身份认同显著相关,具体来说,相较

表1 各影响因素对受访者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N=260)

变量(参照类)	B	SE	Wald	p	Exp(B)
性别(男性)					
女性	.411	.393	1.090	.296	1.508
配偶民族(中国人)					
智利人	-.419	.453	.132	.355	.658
其他或无配偶	-1.392	.808	3.453	.085 ⁺	.249
在智利居住的时间(全年在智利)					
1-2个月不在智利	-.358	.488	.538	.463	.699
3-6个月不在智利	.331	.862	.148	.701	1.392
半年以上不上智利	.171	.713	.057	.811	1.186
国籍及永居权(智利国籍)					
获智利永居权的中国籍	1.679	.590	8.098	.004 ^{**}	5.358
未获智利永居权的中国籍	1.871	.468	15.988	<.001 ^{***}	6.498
移民世代(第一代移民)					
其他后代移民	-2.094	.615	11.577	.001 ^{**}	.123
年龄世代(青年世代)					
中老年世代	-.420	.665	.398	.528	.657
年龄世代×移民世代	1.681	.818	4.226	.040 [*]	5.372
常数项	1.088	.746	2.125	.145	2.969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于已改换智利国籍的受访者,未获智利永久居留权和获得智利永久居留权的受访者都更倾向于认同其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其概率是前者的5.358($p=0.004$)倍和6.498($p<0.001$)倍。事后检验表明,在维持中国国籍的被试中,是否获得智利的永久居留权对建立中国(华)人的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 $p=0.695$;性别、居住时间与民族身份认同的相关均不显著,配偶民族与民族身份认同的相关边缘显著。

总的来说,基于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结果和前文的分析较为一致,也即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存在交互作用。结合深度访谈的资料,本文尝试对上述因素影响民族身份认同的机制和原因进行分析和归纳。

首先,在先赋性认同层面上,总的来说,华人和智利人通婚的比例并不高,即使是在智利土生土长的华人二代移民中,很多人仍然愿意和华人通婚。这一方面是因为父母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华人和自己在文化上更为融洽,更能融入自己的家庭。在我们调查的很多华人家庭中,后代移民也大多选择和华人移民的后代结婚生子。从通婚特点来说,整体而言仍然呈现出早期移民社会的特点,有别于已有第四代第五代移民的华人移民社会。由此可以推测,移民世代和年龄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能不是体现在先赋性认同的层面上。

其次,从结构性认同的形成来看,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出国,因此,很多处于中老年世代的后代移民也是在成年后才抵达智利的。因为有直系亲属(通常是父亲)在智利,很多人较为轻松地就获得了智利的国籍或永居身份,但因为西班牙语的水平较差,其社会融入的能力十分有限,与第一代移民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此外,在中老年世代的受访者中,无论是第一代移民还是其他后代移民,大多数都是从事传统的餐饮业和贸易业的华商,在工作中与华人打交道较多,因而智利人的民族身份很难有机会凸显。在青年世代中,一代移民和后代移民的差别较大。一方面,青年世代的一代移民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移居到智利的主要原因包括出国留学、工作派遣和寻找商机,他们与中老年世代的移民不同,大多把智利作为一个临时的落脚地,并没有在智利长期扎根的打算,也鲜有人改换智利国籍,因而大多数人仍维持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相比之下,在青年世代中,出生于智利的华人后代基本上都是智利国籍,并且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西班牙语语言上很有优势,甚至西班牙语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其中文水平,具备了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的语言能力。此外,智利虽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并没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这也使得华人后代有机会慢慢融入主流社会,建立双重认同或智利人的身份认同。

我儿子和女儿都没有继承我的事业,他们一个是在智利的国企工作,类似中石油,另一个也是在智利的企业,从事保险行业。(H先生)

值得关注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即使控制了国籍及永居权的影响,年龄世代和移民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的交互作用仍然存在,而这可能是由受访者在建构性认同上的差异所导致。在中老年世代中,无论是第二代移民还是第一代移民,基本上都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大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体验较为相似。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生活水平也在大幅度提高,许多中老年人十分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一些已经加入智利国籍的受访者还表达了要改换回中国国籍的想法,且这种想法并不会受到移民世代的影响。在这样的心理驱力下,他们反而更为看重和强调他们的中国人身份。在青年世代中,移民世代的差异则十分明显。第一代移民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大陆,十分熟悉中国的文化风俗,很容易建立起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而对后代移民而言,尽管父母也很重视他们的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教育,但中文教育主要集中在周末,平日主要接受的仍是西班牙文教育,他们更熟悉智利本地的文化习俗。另一方面,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的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当这些青年世代的后代移民回到中国后,会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和他们父母的描述有所差异,他们会感受到一定的文化冲击,很难建立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感,因而更倾向于建立智利华人的双重认同。

五、分析和讨论

近年来海外华人数量与日俱增,海外华人和祖籍国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既往的研究发现,海外华人和祖籍国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可类比于物理学中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相生相制。一方面因远离故土,栖身异乡而产生浓浓的思乡情绪;另一方面,也因为远在他乡,而对祖籍国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既不一味靠近,也不渐行渐远(张康,2017)。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一个很容易引起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便是海外族群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事实上,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因素并不完全是主观的,很多时候也应包括一些客观因素,比如移民所处的年龄世代和其成长的社会背景、移民世代及国籍身份等等。总而言之,移居海外看似是个体性的决定,其背后的社会性张力亦不容被忽视。

本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者都倾向于建立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少数人建立双重认同,鲜有人建立智利人的身份认同。相较于以往的研究大多从一个视角切入,本研究尝试从先赋性认同、结构性认同和建构性认同三个维度同时分析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机制,旨在呈现智利华人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建构机制。结果发现,导致大多数智利华人在民族身份上认同中国人的身份,而不是双重民族身份或智利人身份的原因包括:较低的异族通婚率、普遍不高的社会融入度(如语言能力不高、社会交往对象多为华人)、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和祖籍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等。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青年世代中,移民世代会导致受访者在民族身份认同上存在显著的差别,也即第一代移民比后代移民更倾向于建立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这与大多数移民研究的发现相一致;而在中老年世代中,移民世代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则不显著。总的来说,民族身份认同既有文化依恋的情感内核,也反映了与生存状态有关的工具理性,同时也是维持和提升自尊的结果。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还存在两个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其一是智利华人群体在民族认同上的内部分化;其二是智利华人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发展趋势。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国籍和永居权的作用,移民世代和年龄世代对民族身份认同仍存在交互影响。对此,本研究尝试从两个维度解构这一结果,一个维度是移民社会融入的能力(如西语能力、文化水平和社会网络等);另一个维度是移民社会融入的意愿(如表2所示)。具体来说包括四种类型:高融入能力、强融入意愿的智利华人主要是处于青年世代的后代移民,他们普遍为智利国籍,在民族认同上倾向于建立双重认同;高融入能力、弱融入意愿的智利华人主要是处于青年世代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在文化水平、语言能力和经济实力上强于第一代老移民,但只是把智利作为一个拓展事业的地方,社会融入的意愿不强,很少改换智利国籍,在民族认同上倾向于建立中国人认同;低融入能力、强融入意愿的智利华人主要是处于中老年世代的后代移民,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中国大陆,在成年后才移居智利,与亲人团聚,这部分移民多来自广东省,在智利当地有相当数量的宗亲,愿意在智利长期生活下去,但受限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文化适应的能力较弱;低融入能力、弱融入意愿的智利华人主要是指在处于中老年世代的第一代移民,其中一部分人是先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其他国家(欧洲、南美其他国家)后再辗转到达智利的,他们在智利原本没有社会交往的根基,甚至只是暂居在智利,不做定居的长期打算,跨国生存的特点较为明显。

关于第二个问题,对东南亚华人的长期研究显示,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类型有随时代变迁的明显规律,从早期的中华民族认同逐渐演化成了泛华人认同(庄国土,2011)。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当地华人社团结构、功能和诉求上的演变,还是中国政府在海外华人态度上的政策变化(如支持华人改换当地国籍)都可能是其成因。本研究发现,尽管大多数智利华人较为认同中国人或华人的民族身份,但相比较而言,青年世代的后代华人更倾向于建立双重认同或智利人认同,这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华人身份认同演化规律是类似的。总而言之,当代的智利华人社会仍表现出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的特点。然而,随着青年世代逐渐成为智利华人的主导性力量,智利华人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表2 智利华人的特点及民族认同类型的分布

变量(参照类)	高融入能力、 强融入意愿	高融入能力、 弱融入意愿	低融入能力、 强融入意愿	低融入能力、 弱融入意愿
年龄世代	青年世代	青年世代	中老年世代	中老年世代
移民世代	后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	后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
国籍身份	智利国籍	中国国籍	智利国籍或智利永居	智利国籍或智利永居
民族认同的典型表现	双重认同或智利人认同	中国人认同	中国人认同	中国人认同

一方面,近年来迁居到智利的青年人多来自中国大陆广东省以外的其他身份,他们文化水平较高,从事的行业更为多元化,较少涉及餐饮业,对传统华人组织的依赖程度较低,使得一些以“全体华人华侨”为团结对象的传统社团稍有式微之势,而基于地缘、业缘等关系出现的华人组织则日益增多。尽管这些青年人很难建立智利本地人的认同或双重认同,但和中老年世代的移民相比,表现出了较强的个体主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民族身份的凸显性。另一方面,尽管智利的华人家庭普遍比较重视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的传承,但因为本身工作繁忙,可投入的精力有限,且智利的中文教育大多为私立性质,只在周末开班,致使在智利出生成长的青年一代的中文水平普遍不高,很难对中国文化形成认同和依恋,对“侨界”事务也不再关注。此外,随着青年人语言能力的提高,他们和智利人的通婚率也有所攀升。可以推测,当这批青年人步入中老年后,恐怕很难有动力让其子女再接受中文教育,他们本身也不会建立起对中国社会的乡土产生依恋,智利人或双重民族身份或将成为未来智利华人民族认同的主要形式。

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基于对案例访谈资料和公开资料的分析。受限于个案研究的固有局限,结论的稳健性还有待被进一步挖掘和证实。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存在其他两个待深化的内容。

第一,由于问卷调查的信息有限,本研究仅对与身份认同有关的因素进行相关性检验,并没有进行因果推断。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进一步丰富数据来源,利用更为精细的数据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以便更为全面和严谨地呈现海外华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机制。此外,除了采用问卷调查和案例访谈法之外,还可以采用实验法来研究民族身份认同形成的因果机制。其优势在于,通过操纵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个体因素或情境性因素,揭示出影响海外华人认同的微观心理过程,从而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有关海外华人民族认同的理论。

第二,尽管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将智利华人社会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社会进行比较,但依然没有跳出“国别”研究的框架。例如,包括本文在内的很多研究都发现,移入国家的民族结构、社会政策、华人的自身特征都可能是影响海外华人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用一致的理论框架与概念操作化方法,考察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跨国比较,从而总结出海外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性特征。

参考文献:

- 戴晓东 2005,《当代民族认同危机之反思——以加拿大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
 杜倩萍 2015,《加拿大华人新移民文化认同的人类学思考》,《云南社会科学》第5期。
 郭世宝、郭燕、丁月牙 2014,《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与民族性的复杂性及矛盾性——以加拿大华裔社团的发展为例》,《世界民族》第1期。
 韩震 2010,《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李明欢 2009,《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世界民族》第5期。
 —— 2010,《Diaspora: 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世界民族》第5期。

- 李仁方、陈文君 2015,《智利华商生存与发展境况》,《拉丁美洲研究》第6期。
- 李颖、何涛 2010,《关注智利华人:生活在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决策探索(上半月)》第1期。
- 刘宏 2010,《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开放时代》第8期。
- 2015,《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机制、实证分析、全球比较》,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刘权 2015,《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综观》,《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期。
- 万明钢、高承海、吕超、侯玲 2012,《近年来国内民族认同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第8期。
- 王春光、J. P. BEJA 1999,《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张康 2017,《离散华人族群与祖(籍)国关系变迁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
- 张小倩 2016,《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研究》,《世界民族》第1期。
- 赵志裕、温静、谭俭邦 2005,《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庄国土 2011,《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第5期。
- Benton, G. & E. T. Gomez 2014, “Belonging to the Nation: Generational Change, Identity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Ethnic & Racial Studies* 37(7).
- Hong, Y., C. Y. Chiu, G. Yeung & Y. Y. Tong 1999, “Social Comparison during Political Transition: Interaction of Entity versus Incremental Beliefs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 Kuhn, P.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 Lee, J. & M. Zhou 2004, *Asian American Youth: Culture, Identity and Ethnicity*. New York: Routledge.
- 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egacy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1).
- Tan, C. B. 1997, “Chinese Identities in Malaysi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5(2).
- Wang, G. 1992,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t Leonards: Allen and Unwin.
- 2001,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Zhou, M. 2009,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Zhou, M. & G. Cai 2002, “Chinese Language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Qualitative Sociology* 25(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石金群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Keywords: Japanese Adolescents Hikikomori Problem Evolution Process Social Mechanism

The Reflexiv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Objectific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 *Wang Wenqing & Pan Suiming(59)*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Bourdieu's ideas on reflexive sociology and Habermas's analysis on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sexual violenc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conceptual constitution of sexual violence has obvious imprint of juridification. Regarding the dimension of sexual willingness, it would emphasize the "consent" and ignore the "need". A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sexual willingness, it would emphasize the "duality" and ignore the "continuum".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legal logic originates from the juridification in society and the rising status of law.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legal logic,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sexual violence should examine the daily knowledge of sexual violence and its coping practice, and bring the contents excluded by legal logic into our horizon again.

Keywords: Sexual Violence Reflexive Sociology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 Legal Logic

Emotion, Power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Consumption Labor *Lin Xiaoshan(69)*

Abstract: The daily consumption contains the labor value that couldn't be ign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we should revisit the family daily shopping with dual attributes of consumption and labor, it could help us reveal the trial efficiency mechanism for power operation and gender inequality within fami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third "The Survey of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we find that the factors like conjugal power and emotion involvement, etc. could partly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of labor and consumption within family. Especially after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conjugal power and emotion involvement,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the families where the husbands have more real power, the more emotion involvement the wives would invest, the less probability the husbands would undertake daily shopping; the more emotion involvement the husbands invest, the more probability the wives would undertake daily shopping. However, in the families where wives have more real power,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emotion and power does not reduce the wives' probability of daily shopping significantly, namely the wives always undertake more family daily shopping than the husbands, therefore the gender inequality in consumption labor is reproduced invisibly.

Keywords: Conjugal Power Mode Emotion Involvement Daily Shopping Consumption Labor Gender Inequality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in Chile and Its Differences in Dual-generations

..... *Chen Yongyuan(82)*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and combining the public archival data, 20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survey results from 260 questionnaires together, this study tries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in Santiago, Chile. This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two levels including age generation and immigrant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or most overseas Chinese in Santiago, they tend to construct their ethnic identity as Chinese, followed by dual ethnic identity (both Chinese and Chileans). Few of them construct their ethnic identity as Chileans. There exists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age generation and immigration generation.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the descendants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Chinese, rather than dual ethnic identity or Chilean ethnic identity. However, for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generatio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couldn't lead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thnic identity. This paper could enrich the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provide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expans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in Chile Immigrants Ethnic Identity Case Study